

## 《大藏經綱目指要錄》之版本源流及其海外影響\*

池麗梅、宗艷紅

(日) 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

**摘要：**北宋惟白撰《大藏經綱目指要錄》是失傳已久的開寶藏的綱目提要，曾被收入開寶藏和福州的東禪寺版和開元寺版大藏經。本文梳理其版本源流，顯示三種大藏經中的《指要錄》皆以惟白單刻本為源頭；開寶藏官印本失傳已久，而福州藏本則對後世和周邊國家都有深遠影響。關於《指要錄》版本源流的討論，引發我們思考單刻本與大藏經，以及不同系統大藏經之間的內在關聯，凸顯了福州藏在中土著述方面對開寶藏的繼承與弘揚。

**關鍵詞：**惟白、《大藏經綱目指要錄》、開寶藏、福州藏

在宋代佛教史上，當代祖師接連兩部著作奉敕入藏的事例有二：一為北宋雲門宗第五代禪師佛日契嵩(1007-1072)的《傳法正宗記》和《輔教編》，一為同宗第七代禪師佛國惟白(11世紀後半期-12世紀初期)<sup>1</sup>的《建中靖國續燈錄》和《大藏經綱目指要錄》(下文簡稱《指要錄》)<sup>2</sup>。其中，《指要錄》既是失傳已久的開寶藏(正藏)的綱目提要<sup>3</sup>，自身亦為開寶藏(續藏)奉敕收編的入藏典籍。

《指要錄》的作者惟白出身靜江(今廣西桂林)冉氏<sup>4</sup>，是圓通法

---

\* 本文為日本 MEXT 科研項目“元代官版大藏經の總合研究と大藏經系譜論の再考”(JP22K00060)階段性成果。

<sup>1</sup> 惟白生平，參見：惟白《建中靖國續燈錄》卷十七、(宋)正受《嘉泰普燈錄》卷五、(宋)普濟《五燈會元》卷十六等。惟白傳考，參見宗艷紅《佛國禪師惟白の傳記とその問題點—出身地を例として—》(《仙石山佛教學論集》第12號，2021年，第77-94頁)等。

<sup>2</sup> 契嵩和惟白的入藏著述雖相隔近半個世紀，但仍有共通之處：1) 作者同屬雲門宗；2) 雖奉旨入藏，然印經院並未予以雕板；3) 它們在中原系統大藏經本中散佚殆盡，以福州藏本為其最早版本。關於《傳法正宗記》和《輔教編》的入藏事宜，參見：池麗梅《契嵩二作之入藏始末——兼論福州二藏之目錄分歧》，《文史》，2023年第3輯，第91-110頁。

<sup>3</sup> 《指要錄》卷八載：“若通前計大小乘經律論，總五千四十餘卷、四百八十帙，以《開元釋教錄》為準，則今撮略品目所集也。其餘隨藏添賜經傳三十帙、未入藏經二十七帙，天下寺院藏中或有或無，印經官印板卻足，故未錄略在，知者可鑒耳。”(中華再造善本《大藏經綱目指要錄(全八冊)》，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2003年。本文所引《指要錄》皆據此版本，下文不再出注。)據此可知，《指要錄》乃集“五千四十餘卷，四百八十帙，以《開元釋教錄》為準”之大藏撮略，並未涉獵“印經官印板”之“隨藏添賜經傳三十帙，未入藏經二十七帙”。李富華、何樞《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》(北京：宗教文化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78-80頁)指出：所謂“印經官印板”即開寶藏，且《指要錄》的千字文編號與開寶藏存本相符，可以肯定《指要錄》所據之智者禪寺大藏經即官版開寶藏。

<sup>4</sup> 關於惟白的籍貫尚有爭議。李思穎《北宋惟白禪師籍貫師承考》(《法音》2018年第9期，第23-26頁)認為是江蘇靖江，但宗艷紅《佛國禪師惟白の傳記とその問題點—出身地を例として—》(《仙石山佛教學論集》第12號，2021年，第77-94頁)指出惟白的籍貫當為靜江(現廣西桂林一帶)。

秀 (1027-1090)<sup>5</sup> 的衣鉢傳人。惟白先於建中靖國元年 (1101) 七月十五日進獻《建中靖國續燈錄》三十卷，八月十五日蒙徽宗賜序，同月二十六日奉敕入藏<sup>6</sup>。崇寧二年 (1103) 八月十八日，惟白前往婺州 (今浙江金華) 金華山智者禪寺閱藏，並於翌年 (1104) 二月三日撰成《指要錄》八卷<sup>7</sup>，後於崇寧四年 (1105) 十月二十八日奉敕入藏<sup>8</sup>。

到目前為止，學者關於《指要錄》的研究側重其與開寶藏的關係並據其復原開寶藏，對於《指要錄》本身之入藏始末、版本源流等問題，尚未予以足夠重視<sup>9</sup>。因此，本文擬以福州藏本《指要錄》為突破口，追溯其版本源流和海外傳播，探討福州藏對開寶藏的繼承與弘揚，及其對後世和日本的影響。

<sup>5</sup> 法秀的傳記，見 (宋) 惟白《建中靖國續燈錄》卷十、(宋) 惠洪《禪林僧寶傳》卷二十六、(宋) 普濟《五燈會元》卷十六、(宋) 紹曇《五家正宗贊》卷四等。

<sup>6</sup> 關於《建中靖國續燈錄》的入藏始末，參照：《建中靖國續燈錄》卷一首附徽宗《御制建中靖國續燈錄序》(《新纂大日本續藏經》編號 1556，第 78 冊，第 640 頁下欄 - 第 641 頁上欄)、卷三十末附惟白《上皇帝書》(第 826 頁下欄 - 第 827 頁中欄)、張敦禮《上皇帝劄子》(第 827 頁中欄 - 下欄)、希式《付受次第》(第 828 頁上欄 - 第 829 頁上欄)、張敦禮《恭發願文》(第 829 頁上欄)。

<sup>7</sup> 《大藏經綱目指要錄》卷八《五利五報述》載：“崇寧二年癸未春，得上旨遊天台。中秋後三日，至婺州金華山智者禪寺閱大藏經。仲冬一日丁醜，援筆撮其要義。次年甲申仲春三日丁未畢之，計二十餘萬字。”

<sup>8</sup> 參照：《大藏經綱目指要錄》卷一前附尚書省敕牒。關於此官文書，下文有詳細討論。

<sup>9</sup> 從研究大藏經的角度關注《指要錄》的有童瑋《北宋開寶大藏經雕印考釋及其目錄還原》(北京：書目文獻出版社，1991 年)，李富華、何梅《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》，李富華《金藏：目錄還原及研究》(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2 年)，何梅《歷代漢文大藏經目錄新考》(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14 年，上冊第 29-34 頁)等。從禪籍入藏的角度討論過《指要錄》的包括 [日] 柳田聖山《大藏經と禪錄の入藏》(《印度學佛教學研究》第 20 卷第 1 號，1971 年，第 76-83 頁)，[日] 椎名宏雄《宋元代の大藏經と入藏禪籍》(《駒澤大學佛教學部論集》第 16 號，1985 年，第 245-290 頁)，[日] 椎名宏雄《宋元版禪籍の研究》(東京：大東出版社，1993 年)等。

## 一、東禪寺版《指要錄》及其底本來歷

宋元時代的刻本大藏經被分為三個系統，即中原系統（開寶藏、金藏、高麗藏）、北方系統（遼藏）和江南系統（福州東禪寺版和開元寺版、思溪藏、磧砂藏、普寧藏）<sup>10</sup>。宋元版大藏經中，唯有開寶藏和福州二藏收編過《指要錄》，前者失傳已久，後者亦僅有少量存本傳世。日本收藏的福州藏中，宮內廳書陵部<sup>11</sup>、高野山<sup>12</sup>、南禪寺<sup>13</sup>、本源寺<sup>14</sup>藏本中《指要錄》缺本，東寺<sup>15</sup>和知恩院<sup>16</sup>雖有藏本但內情不詳。本文擬據日本的醍醐寺、金澤文庫，以及中國國家圖書館的三種藏本，討論《指要錄》的版本及其源流。

<sup>10</sup> 關於宋元時代刻本大藏經的分類，參照：[日]竺沙雅章《契丹大藏經小考》，《東洋史論集：內田吟風博士頌壽記念》（京都：同朋舍，1978年，第311-329頁），後收入竺沙雅章《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》（東京：汲古書院，2000年，第292-311頁）；竺沙雅章《漢譯大藏經の歴史—写經から刊經へ—》（大谷大學，1993年），後收入氏著《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》，第271-291頁；方廣錫《八一十世紀佛教大藏經史》（198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系博士學位論文，後收入《法藏文庫》碩博士學術論文、中國佛教學術論典52，高雄：佛光山文教基金會，2002年）；方廣錫《佛教大藏經史（8-10世紀）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1年）等。

<sup>11</sup> [日]宮內省圖書寮編《圖書寮漢籍善本書目》之《附錄：大藏經細目》（東京：文求堂、松雲堂，1931年）載：“溪字函缺”（第105頁左）。

<sup>12</sup> [日]水原堯榮《勸學院藏宋板一切經目錄》，《高野山見存藏經目錄》（《水原堯榮全集》第4卷，京都：同朋舍，1981年），第140-548頁。

<sup>13</sup> [日]《南禪寺經藏一切經目錄》載：“溪《大藏經綱目指要錄》八卷〈此帙缺本〉”，高楠順次郎編《昭和法寶總目錄》第一卷，東京：大正一切經刊行會，1929年，第849頁上欄。

<sup>14</sup> [日]小島惠昭等《本源寺藏宋版一切經調查報告》（《同朋學園佛教文化研究所紀要》創刊號，1979年，第85-269頁）。本《報告》未載“溪”字函，說明該函缺本。

<sup>15</sup> [日]《東寺經藏一切經目錄》載：“溪（1278）《大藏經綱目指要錄》八卷〈卷第一崇寧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刊，卷第二乃至第八無刊記〉一帙”，《昭和法寶總目錄》第一卷，第819頁中欄。

<sup>16</sup> [日]《知恩院一切經目錄》載：“溪《大藏經綱目指要錄》〈八卷〉同集”，《昭和法寶總目錄》第一卷，第904頁中欄。

醍醐寺藏《指要錄》(下文簡稱“醍醐寺本”)共八卷,千字文編號“溪”530函,經折裝。行款較為獨特,每半葉4行,每行18-20字左右,單邊版框,行間有界欄。少數版心可見刻工名:“卓立”(卷一第1、2、27、28版;卷二第20版)、“丁紹”(卷一第7、8版;卷二第3、4版)、“紹”(卷二第28版)、“丁宥”(卷一第25版)、“丁”(卷二第29版;卷三第13、14版)、“口”(卷四第5版)、“中”(卷六第7版)。各卷均有印記:“福州東禪經生張榮印造”(卷一-六、卷八);“東禪”(卷一、卷二、卷四、卷五、卷七);“東禪”和“東禪大藏”(卷三、卷六和卷八紙背)。卷末附刻題記:“都勸首住持傳法沙門普明”(卷二);“都勾當藏主沙門師悟,都勸首住持傳法沙門普明,前都勸首住持傳法慧空大師冲真”(卷一、卷五-七);“參學禪智大師希式校對,監寺慧覺大師宗秀句幹,都勾當藏主沙門師悟,都勸首住持傳法沙門普明,前都勸首住持傳法慧空大師冲真”(卷八)<sup>17</sup>。

醍醐寺本的印記和卷末題記證實了它屬於東禪寺版,唯其外形特徵甚為獨特。東禪寺版的標準版式是每版6個半葉、每半葉6行、每行平均17字,行間無界欄;大多數經本卷首附題記,函末附音義冊。然而醍醐寺本是每半葉4行、每行18-20字、行間刻界欄,既無卷首題記又無音義,首題、尾題下或版心亦不標千字文號,與東禪寺版的標準格式大相徑庭。這些特徵指向了一種可能性,即東禪寺版《指要錄》或是覆刻了某種北宋單刻本。

醍醐寺本中沒有紀年題款,考慮到其前“磻”529函《建中靖國續燈錄》雕造於崇寧三年(1104)、而緊隨其後的“伊”531函的幾部

<sup>17</sup> [日]總本山醍醐寺編《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》(東京:汲古書院,2015年)第4冊,第723-727頁。

御制撰集雕造於大觀三年(1109)，則《指要錄》雕成並編入東禪寺版當在崇寧三年和大觀三年之間。那麼，它所依據的北宋刻本又是何來歷呢？要解決這個問題，須先釐清《指要錄》之入藏始末，而醍醐寺本卷一前所附官文書為此提供了重要線索。

尚書禮部：

准崇寧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勅：

中書省：

尚書省送到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惟白狀：

“昨往泗州塔下、天台諸處名山禪誦，因閱大藏經撮成《綱目指要錄》，則伍仟餘卷經律論，卷卷標指，壹萬餘品目，品品解義。已廣神宗皇帝聖語云‘諸佛所說妙法’之旨，貴流通天下，助揚今上皇帝紹述金輪聖化。惟白今將所印《大藏經綱目指要錄》捌冊，乞付印經院隨大藏經流行，使佛法慧命傳布無窮，祝延聖壽，此外並無干求。乞特賜敷奏。”

申聞。事仍連元狀並捌冊。

十月二十八日奉聖旨：“許入大藏，其惟白賜空名度牒貳道。”

奉勅如右，牒到奉行。

前批內度牒，降敕下禮部。

十一月一日午時，付禮部施行，仍關合屬去處。

右告示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惟白，仰詳上項勅命指揮知委。

崇寧四年十一月 日。

祠部員外郎葉

祠部員外郎張

侍郎劉  
尚書<sup>18</sup>

據此可知，惟白於崇寧四年初進獻《指要錄》，十月二十八日奉旨入藏並獲兩道空名度牒。十月二十九日中書省形成敕書，並於十一月一日向尚書省禮部下達聖旨；隨後，尚書省禮部再形成敕牒，向惟白本人傳達聖旨。《指要錄》卷首所附官文書，當即惟白所奉敕牒<sup>19</sup>。敕牒中引《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惟白狀》“今將所印《大藏經綱目指要錄》捌冊，乞付印經院隨大藏經流行。”既言“所印《大藏經綱目指要錄》捌冊”，可見惟白在進獻《指要錄》之前已預先雕成經板，欲將經板交付印經院用於印造並隨官版開寶藏流通。既然惟白上書所請獲准，其所備經板必已上交印經院，而此後印經院發行的官印本《指要錄》，當即出自惟白的私家單刻版。對於新編入藏的中土著述，印經院不予雕版的現象其實並不罕見：早年天台教典編聯入藏之際即流用吳越舊板<sup>20</sup>；惟白的《建中靖國續燈錄》奉旨入藏後，亦由越國長公主的駙馬張敦禮籌備雕板<sup>21</sup>。《指要錄》的特殊性

<sup>18</sup> 《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》第4冊，第723-724頁。

<sup>19</sup> 關於該公文書之格式調整和內容解讀等，承蒙蘇州大學丁義珏、上海師範大學劉江兩位老師的賜教，謹注明以表謝意。

<sup>20</sup> 對於北宋新賜入藏的中土著述或文匯，開寶藏似乎不予其千字文編號，而多採用隨藏流通的方式；印經院亦不為其雕造經板，或沿用陳年舊板或由作者等自費雕印。例如，天台教典於天聖四年（1026）奉旨入藏時，朝廷降旨命杭州進獻吳越杭版天台教典的舊板，唯其缺損部分則另予補板。關於天台教典的入藏經過，參照：池麗梅《天台教典的域外回流及入藏始末》，《世界宗教文化》2022年第6期，第170-177頁。

<sup>21</sup> 《建中靖國續燈錄》是惟白的首部入藏作品，該錄由駙馬張敦禮於建中靖國元年（1101）七月十五日啟奏進獻，同年八月二十六日奉旨入藏，十月十日張敦禮於杭州募工雕板摹印。詳情參照：《建中靖國續燈錄》卷三十末附張敦禮《上皇帝劄子》（第827頁中欄-下欄）、希式《付受次第》（第828頁上欄-第829頁上欄）、張敦禮《恭發願文》（第829頁上欄）。

在於惟白奏請入藏之前已預先備好經板，或許是因為他已經歷過《建中靖國續燈錄》的入藏審批，比較熟悉相關流程和規則。

筆者推測，東禪寺版《指要錄》所據之底本當即印經院官印本《指要錄》，理由有三。首先，於卷首附刻敕牒的做法，當始於印經院官印本。其次，東禪寺版《指要錄》行款獨特，經本中未刻千字文函號，卷首無題記，函末亦無音義冊，說明其底本原為單刻本。最後，東禪寺版《指要錄》中“玄”、“敬”、“竟”、“弘”、“貞”、“殷”等字缺筆<sup>22</sup>，避諱缺筆字在東禪寺版中相對罕見，但在開寶藏中則屬常規。由此可見，東禪寺版《指要錄》同時具備了單刻本和官印本的雙重特徵，其原因當即該本覆刻了印經院官印本，而官印本之前身乃是惟白單刻本。

## 二、開元寺版《指要錄》

據筆者所知，除了日本的知恩院和金澤文庫，中國國家圖書館亦藏有一套開元寺版《指要錄》，本節擬據金澤文庫和中國國家圖書館的藏本開展討論。首先，金澤文庫藏《指要錄》(下文簡稱“金澤文庫本”)現存七卷(卷一缺本)，經折裝，千字文編號“溪”530函<sup>23</sup>。每半葉4行、每行18-20字、單邊版框，行間刻界欄<sup>24</sup>，既無卷首題記又無音義，與開元寺版的標準格式不同，但與醍醐寺本非常相似。

<sup>22</sup> [日]佐々木勇《親鸞の缺筆—親鸞が影響を受けた文獻群—》，《浄土真宗總合研究》第8號，2014年，第104-105頁。

<sup>23</sup> [日]神奈川縣立金澤文庫編《稱名寺大藏經：重要文化財宋版一切經目錄》，京都：臨川書店，2023年，第544-545頁。

<sup>24</sup> [日]神奈川縣立金澤文庫編《神奈川縣立金澤文庫保管宋版一切經目錄》，橫濱：神奈川縣立金澤文庫，1998年，第43頁載《指要錄》卷二圖版。

金澤文庫本有兩則卷末題記，一刻於卷四：“奉佛弟子棄允麟為室中□十八娘及弟子莫詢等，共施淨財一拾貫文省，雕斯經板一卷，廣流聖教，各為所生父母，願超淨界者”<sup>25</sup>；一刻於卷七：“景星院比丘尼志真、志堯、志義、志辨，共捨斯經半卷，奉為在堂二親祈保平安者。比丘尼志宗、志誠、法通、覺尚、資應、義和、資性、資先、志妙、資敏、資光，捨開經板共二十二片；又比丘尼德忠、志崇、志隨、資喜，尼童以守、法堅，各捨經板一片，普符逐人願心，功德圓滿者”<sup>26</sup>。此外，金澤文庫本幾乎每版都有刻工名：

卷二：①陳章②鄭才③李義④王浩⑤陳甫⑥郭文⑦陳丈⑧王珣⑨楊宗⑩林近⑪王保⑫史得⑬李贊⑭吳昇⑮吳昇⑯遇⑰郭遇⑱六生⑲陳生⑳郭文㉑林近㉒孫仁㉓吳賓㉔陳文㉕昱㉖郭文㉗何文㉘郭仲㉙鄭昌㉚丘受㉛懋㉜王浩

卷三：①石祐②石老③李保④林賜⑤石祐⑥吳昇⑦鄭受⑧楊□⑨陳從⑩陳從⑪□⑬□⑭王珣⑮史得⑯鄭昌⑰陳章⑱陳生⑲吳昇⑳友㉑友㉒重才㉓郭文㉔李贊㉕陳文㉖陳甫㉗林賜㉘林賜

卷四：①李秀③孫仁④陳章⑤昱⑥鄭受⑦高中⑧陳生⑨郭文⑩鄭昌⑪鄭行⑬□⑭陳□⑮林志⑯林近⑰陳文⑱陳楷⑲陳右⑳陳□㉑李㉒鐘才㉓茂㉔□㉕吳賓㉖史得㉗林近㉘郭文㉙石老⑳石祐㉑昌㉒丁保㉓甘正

<sup>25</sup> 《稱名寺大藏經：重要文化財宋版一切經目錄》，第544頁。引文標點是筆者所加。文中的“棄允麟”當作“葉允麟”，“為室中”當作“與室中”。

<sup>26</sup> 《稱名寺大藏經：重要文化財宋版一切經目錄》，第544頁。引文標點是筆者所加。

卷五：②中③侃④昞⑥齊昌⑦邵保⑧陳俊⑨昞⑩侃 11老 12邵保 13齊昌 14老 15王受 16老 17侃 18中 19張和 20鐘才 21鐘才 22李秀 23李保 24陳立 25丘與 26茂 27綬 28昞 29林近 30付言 31程保 32程保 33侃 34傳言

卷六：①付言②付中③付言④昱⑤姚才⑥阮生⑦陳生⑧李秀⑨陳從⑩懋⑪綬⑫吳昇⑬石祐⑭陳甫⑮阮生⑯付中⑰林志⑱鄭受⑲陳甫⑳楊宗㉑李義㉒林賜㉓鐘才㉔六生㉕丘與㉖郭文㉗陳章㉘陳章㉙昱㉚得㉛昱㉜李秀㉝吳賓㉞崔大㉟崔大㊱阮生㊲阮生㊳阮生

卷七：①石老②□③高中④楊寔⑥吳賓⑦鄭受⑧□⑨孫仁⑩鄭行⑪丘□⑫李保⑬王□⑭六生⑮昞⑯友⑰才⑱李⑲丘受⑳李秀㉑王珣㉒王珣㉓郭文㉔丘受㉕茂㉖孫生㉗陳立㉘六生㉙陳右㉚友㉛付中㉜楊宗㉝郭中㉞邵保㉟王浩㊱鄭昌㊲鄭受

卷八：①高中②丘與③吳賓④鄭才⑤吳先⑥李保⑦昱⑧陳章⑨才⑩李保⑪昱⑫陳右⑬韓通⑭王昞⑮大<sup>(六か)</sup>⑯楊宗⑰楊宗⑱鄭行⑲丘受⑳程保㉑陳右㉒懋㉓丘受㉔付中㉕郭文㉖高中㉗大<sup>(六か)</sup>㉘齊昌㉙阮生刀⑳石老㉑阮生㉒傳言<sup>27</sup>

金澤文庫本與醍醐寺本相比，千字文函號、分卷、行款等特徵的一致說明二者版本同源，但卷末題記和刻工的差異又說明二者版本不同，各自代表了南宋開元寺版<sup>28</sup>和北宋東禪寺版的特徵。

<sup>27</sup> 《稱名寺大藏經：重要文化財宋版一切經目錄》，第544-545頁。刻工名前的①②等數字代表版次。

<sup>28</sup> 金澤文庫本沒有紀年題款，無法斷定其雕造時間。但考慮到開元寺版“磻”529函《建中國續燈錄》和“伊”531函御制撰集的卷首題記多作“紹興十八年(1091)閏八月”，可推知“溪”530函《指要錄》的雕版當在同一時期。

除了日本藏本以外，中國國家圖書館也藏有一套宋版《指要錄》(下文簡稱“國圖本”)<sup>29</sup>，已於2013年入選《第四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》<sup>30</sup>。作為我國現藏唯一的宋版《指要錄》，國圖本在國內較有影響：其影印本先被收入《中華大藏經(漢文部分)》第56冊(1993年)<sup>31</sup>；2003年再被編入中華再造善本系列<sup>32</sup>；2020年夏志前據後者整理出版了點校本<sup>33</sup>。

國圖本共八卷，經折裝，卷二第8版下欄外有兩行小字墨迹：“於田反，亦作研摩也”，卷三缺第6版。外形特徵與金澤文庫本相同，每版6個半葉、每半葉4行，每行18-20字左右，單邊版框，行間有界欄。版心在每版第2和第3半葉之間，格式、字體不甚規範：正規格式作“溪指要錄一卷五石祐”，略作“指要錄一卷五”；千字文正作“溪”，亦作“奚”或“磻”等；文獻名正作“指要錄”，略作“旨要錄”或“要錄”等。卷五尾題下刻“磻”字、卷七尾題下

<sup>29</sup> 北京圖書館編《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》(北京：書目文獻出版社，1987年)〈子部·釋家類〉載：“大藏經綱目指要錄八卷〈宋釋惟白撰宋刻本/小字雙行上下單邊〉八冊四行十八或二十字不等四五二一”(第1635頁)。

<sup>30</sup> 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編《第四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》(漢文珍貴古籍名錄〈宋遼夏金元時期〉，北京：國家圖書館出版社，2014年)載：“099699大藏經綱目指要錄八卷(宋)惟白撰宋刻本。經折裝。匡高22.4釐米，廣10.5釐米。半葉四行，行十八至二十字不等，上下單邊。國家圖書館藏”(第156-157頁)。

<sup>31</sup> 《大藏經綱目指要錄》，中華大藏經編輯局編《中華大藏經(漢文部分)》第56冊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3年，第116-250頁。卷一《校勘記》載：“底本，宋崇寧藏本。”(第131頁)，未注明其底本的收藏單位。經覈對，中華藏本的卷尾題記、版心、千字文、刻工名等各項特徵均與國圖藏本相符，中華藏本之底本當即國圖本。但中華藏本的排版經過調整：將尚書敕牒從卷一首移至卷八末，敕牒前原有三種藏書印，其中“北京圖書館藏”、“星吾海外訪得秘笈”二印已被抹消，唯餘“李國松藏”一印。

<sup>32</sup> 《大藏經綱目指要錄(全八冊)》(中華再造善本、唐宋編、子部)，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2003年。

<sup>33</sup> 惟白集、夏志前整理《大藏經綱目指要錄》(雲門宗叢書，全2冊)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20年。

刻“溪”字，皆為千字文函號。國圖本中亦有刻工名，除劃線處以外，大部分與金澤文庫本一致：

卷一：②昱③王珣④張文⑤石祐⑥陳生⑦老⑧近⑨陳聰⑩大⑪陳文⑬甘⑭賜⑮丘與⑯李秀⑰鄭受⑱李保⑲菝⑳高忠㉑昇㉒陳從㉓石老㉔鄭昌㉕何中㉖郭文㉗陳立㉘吳先㉙韓通㉚鐘才㉛王浩㉜張和㉝王浩

卷二：①陳章②鄭才③李義④王浩⑤陳甫⑥郭文⑦陳文⑧王珣⑨楊宗⑩林近⑪王保⑫史得⑬李贊⑭吳昇⑮吳昇⑯遇⑰郭遇⑱六生⑲陳生⑳郭文㉑林近㉒孫仁㉓吳賓㉔陳文㉕昱㉖郭文㉗陳文㉘郭仲㉙鄭昌㉚丘受㉛懋㉜王浩㉝王浩

卷三：①石祐②石老③李保④林賜⑤石祐⑥(缺版)⑦鄭受⑧楊宴⑨陳從⑩陳從⑪王保⑫丘與⑬正⑭王珣⑮史得⑯鄭昌⑰陳章⑱陳生⑲吳昇⑳友㉑友㉒林志㉓郭文㉔李贊㉕陳文㉖陳甫㉗林賜㉘林賜

卷四：①李秀③孫仁④陳章⑤昱⑥鄭受⑦高中⑧陳生⑨郭文⑩鄭昌⑪孫生⑫鄭行⑬陳聰⑭林志⑯林近⑰陳文⑱陳右⑲陳甫⑳李㉑吳賓㉒史得㉓郭文㉔石老㉕石祐㉖昌㉗丁保㉘甘正

卷五：②中③侃④昞⑥齊昌⑦邵保⑧陳俊⑨昞⑩侃⑪老⑫邵保⑬齊昌⑭老⑮王受⑯老⑰侃⑱中⑲張和⑳鐘才㉑鐘才㉒李秀㉓李保㉔陳立㉕丘與㉖茂㉗綬㉘昞㉙林近㉚付言㉛程保㉜程保㉝侃㉞傅言

卷六：①付言②付中③付言④昱⑤姚才⑥阮生⑦陳生⑧李秀⑨陳從⑩懋⑪綬⑫吳昇⑬石祐⑭陳甫⑮阮生⑯付中⑰林志⑱鄭受⑲陳甫⑳楊宗㉑李義㉒林賜㉓鐘才㉔六生㉕丘與㉖郭文㉗陳章㉘陳章㉙昱㉚

得③①昱③②李秀③③吳賓③④崔大③⑤崔大③⑥阮生③⑦阮生③⑧阮生

卷七：①石老②才④高中⑤楊寔⑥吳賓⑦鄭受⑧芟⑨孫仁⑩鄭行⑪丘與⑫李保⑬吳賓⑭王浩⑮六生⑯昞⑰友⑱才⑲李⑳丘受㉑李秀㉒王珣㉓王珣㉔郭文㉕丘受㉖芟㉗孫生㉘陳立㉙六生㉚陳右㉛友㉜付中㉝楊宗㉞郭仲㉟邵保㊱王浩㊲鄭昌㊳鄭受

卷八：①高中②丘與③吳賓④鄭才⑤吳先⑥李保⑦昱⑧陳章⑨才⑩李保⑪昱⑫陳右⑬韓通⑭王昞⑮大⑯楊宗⑰楊宗⑱鄭行⑲丘受⑳程保㉑陳右㉒懋㉓丘受㉔付中㉕郭文㉖高中㉗大㉘齊昌㉙阮生㉚石老㉛阮生㉜傳言

國圖本亦有兩則卷末題記，一見卷四末：“奉佛弟子葉允麟與室中薩十八娘及弟子莫詢等，共施淨財一拾貫文省，雕斯經板一卷，廣流聖教，各為所生父母，願超淨界者”；一見卷七末：“景星院<sup>34</sup>比丘尼志真、志堯、志義、志辨，共捨斯經半卷，奉為在堂二親祈保平安者。比丘尼志宗、志誠、法通、覺尚、資應、義和、資性、資先、志妙、資敏、資光，捨開經板共二千二片<sup>35</sup>；又比丘尼德忠、志崇、志隨、資喜，尼童以守、法堅，各捨經板一片，普符逐人願心，功德圓滿者。”兩則題記的位置和內容皆與金澤文庫本相同。

國圖本上鈐幾種朱印：卷一首有“北京圖書館藏”印（陽刻方形）、

<sup>34</sup> 此景星院，當即北宋福州知名的尼眾道場景星尼院。據（宋）梁克家纂修《淳熙三山志》卷三十三載，景星尼院位於懷安州（今福州）東北，陳太建二年（570）創建，原是僧寺，北宋元豐二年（1079）尼僧在淳復興後改為尼寺，以尼眾戒壇聞名。見中華書局影印本《宋元方志叢刊》第八冊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0年，第8149頁。

<sup>35</sup> 題記中“二千二片”當為“三十二片”之誤。

“李國松藏”印(陰刻方形)、“星吾海外訪得秘笈”印(陽刻長方);同卷首題下有“肥遁廬”(陽刻方形);卷二、卷三、卷七首題下有“星吾海外訪得秘笈”印<sup>36</sup>。“李國松藏”和“肥遁廬”是民國時期藏書家李國松(1878-1949)藏書印<sup>37</sup>,而“星吾海外訪得秘笈”則是清末楊守敬(1839-1915)藏書印。楊守敬,字惺吾,晚年號鄰蘇,湖北省宜都人。自1880至1884年,他作為駐日公使何如璋的隨員居留日本,其間殫精竭慮地收集中國古籍佚書等,至回國時攜三萬餘卷滿載而歸<sup>38</sup>。《鄰蘇園藏書目錄》所載“(取來)宋槧佛經全藏目錄八本”<sup>39</sup>,當即現在的國圖本。也就是說,此本原藏日本,十九世紀末由楊守敬傳回國內,後經手李國松,最終入藏北京圖書館即現在的中國國家圖書館。

清末回流的國圖本至今仍是宋版《指要錄》之海內孤本,因其行款獨特罕見,版本屬性難辨,多被鑒定為“宋刻本”<sup>40</sup>。然如上所述,國圖本的版心和經題下有千字文號,想必不是單刻本,而是某種宋版大藏經之零本。在宋版大藏經中,唯有開寶藏和福州二藏收編過《指

<sup>36</sup> 關於藏書印,承蒙上海師範大學定源法師(王招國教授)賜教。謹此注明,以表謝意。

<sup>37</sup> 李國松,字健父,號木公、盤齋等,安徽省合肥人,民國時期的著名藏書家。其書齋號稱“集虛草堂”、“肥遁廬”、“望雲草堂”,藏書印則有:“合肥李氏望雲草堂珍藏金石書畫之章”、“李國松藏”、“木公珍藏”、“合肥李國松健父所刊書”、“木公辛亥以後所得”、“盤齋珍秘”等。

<sup>38</sup> (清)楊守敬《訪書志序》,《日本訪書志》第一冊,蘇州:鄰蘇園,清光緒二十三年(1897)刊。

<sup>39</sup> 湖北省博物館編《鄰蘇園藏書目錄》,上海辭書出版社,第56頁(圖版)、第135頁(錄文)。關於《鄰蘇園藏書目錄》所載《指要錄》,承蒙京都國立博物館的上杉智英老師賜教。謹此注明,以表謝意。

<sup>40</sup> 《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》,第1635頁;《第四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》,第156-157頁。

要錄》，國圖本的題記又排除了開寶藏的可能性，那麼它祇能是福州藏的一種。與醍醐寺本相比，國圖本與金澤文庫本的相似度更高：1) 卷四和卷七的卷末題記相同；2) 卷五、卷七尾題下的千字文號相同；3) 國圖本卷二至卷七的刻工亦與金澤文庫本（卷一缺本）大體相符，細微差異尚有待核對金澤文庫本原件。種種跡象顯示，國圖本與金澤文庫本版本相同，也是開元寺版。

此外，通過國圖本、金澤文庫本與醍醐寺本的比較，還可歸納幾點開元寺版和東禪寺版的異同。第一，兩者的外形特徵接近：同為經折本，卷數、版數、行數、字數，版框和界欄等特徵相符。第二，兩種版本的文獻內容相同：都有避諱缺筆字，卷一首附官文書，無卷首題記或隨函音義等。第三，兩者還有幾點顯著差異：1) 刻工不同；2) 卷末題記不同；3) 東禪寺版正文沒有千字文號，開元寺版卷五、卷七尾題下各有一個千字文號。以上跡象顯示東禪寺版和開元寺版各有所據：東禪寺版覆刻的是北宋官印本，開元寺版則以東禪寺版為底本雕就，但調整了版心和千字文，還加刻了兩條刊記。

### 三、《指要錄》之海外影響——日本的五山版和古活字版

南宋以後，《指要錄》再未被收入中國刻本大藏經，亦未有單刻本傳世。但它隨福州藏傳到日本以後，在當地衍生了兩種版本：一是南北朝時期(1336-1392)的五山版《指要錄》(下文簡稱《五山版》)；一即江戶初期萬治二年(1659)京都中野市右衛門刊印的古活字版《指要錄》(下文簡稱《中野版》)。

東京五島美術館大東急記念文庫藏有一套《五山版》，屬於南北朝刊本的晚期印本，所據底本當為宋代刻本<sup>41</sup>。2015年出版的《五

山版中國禪籍叢刊第三卷：燈史三他》影印刊登了大東急記念文庫藏本<sup>42</sup>，椎名宏雄推測其底本非東禪寺版即開元寺版<sup>43</sup>。2020年1月21日，筆者於大東急記念文庫考察了五山版本原件。該本為線裝本，一函8冊，藏藍色函套（新裝），淺褐色封面（新裝）。每冊高26.5釐米、寬21.3釐米，封面左上角附題簽“大藏經綱目指要錄一”（以第1冊為例）。第1冊65頁、第2冊67頁、第3冊55頁、第4冊66頁、第5冊67頁、第6冊76頁、第7冊73頁、第8冊63頁。無舊藏書印。卷八尾題下刻題記：“□□□刊之／大慶院伯壽”。每版上下有單邊版框，行間有界欄，每行若大字則18字，若雙行小字則20字左右。

五山版本兩種版心<sup>44</sup>：其一為五山版本自身的版心，數量不多，且集中於第一和第二冊；其一即五山版本所據底本的原版心。後者的原版心有規律地出現在原版正文第8和第9行之間，版心內容多與開元寺版《指要錄》相符：1) 五山版本第一冊第9頁原版心作“溪指要錄一卷五石祐”，與開元寺版卷一第5版版心內容一致；2) 五山版本原版心殘留了少數刻工名，尚可辨識的有“石祐”（卷一第5版）、“友”（卷三第21版）、“林賜”（卷三第27、28版）、“中”（卷

<sup>41</sup> [日]川瀨一馬《大東急記念文庫貴重書解題（第2卷）—佛書之部—》，東京：大東急記念文庫，1956年，第153頁；川瀨一馬《五山版の研究》，東京：日本古書籍商協會，1970年，上冊第415頁。圖版見：《大東急記念文庫貴重書解題—佛書之部—》，No.59；《五山版の研究》下卷，第106頁，No.233。

<sup>42</sup> [日]椎名宏雄編《五山版中國禪籍叢刊第三卷：燈史三他》，京都：臨川書店，2015年，第409-688頁。

<sup>43</sup> 《五山版中國禪籍叢刊第三卷：燈史三他》，第718頁。關於五山版本的版本資訊，詳見椎名宏雄《解題—〈大藏經綱目指要錄〉八卷八冊》，第717-722頁。

<sup>44</sup> 《大東急記念文庫貴重書解題（第2卷）—佛書之部—》，第153頁；《五山版の研究》上冊，第415頁；《五山版中國禪籍叢刊第三卷：燈史三他》，第718頁。

五第2、18版)、“保”(卷五第3版)、“𠄎”(卷五第4版)、“才”(卷五第15版)<sup>45</sup>。除卷五第15版的“才”以外，其餘皆與開元寺版相符。此外，五山版本還有兩項特徵與開元寺版一致：1)“玄”、“敬”、“竟”、“弘”、“貞”、“殷”等避諱字缺筆；2)卷五、卷七尾題下各有千字文“磻”和“溪”。此類特徵顯示《五山版》覆刻的是開元寺版，但有一定程度的改版和調整。

《五山版》問世三百多年以後，至江戶初期又出現了古活字版《指要錄》(即《中野版》)。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經書院文庫藏有一套《中野版》<sup>46</sup>，其卷尾有木記：“萬治二巳亥年仲冬吉日，中野氏市右衛門開板”，據此可知《中野版》最初由京都中野市右衛門於萬治二年(1659)十一月刊行<sup>47</sup>。與傳統的福州藏本或《五山版》相比，《中野版》有以下幾點顯著變化：1)將傳統的八卷本《指要錄》的卷二、卷四、卷五、卷六、卷七又細分為上、下，因而變成十三冊；2)行款亦大有改變：單邊版框、行間無界欄；每版14行、每行大字19字或雙

<sup>45</sup> 椎名宏雄指出五山版本中殘留的底本刻工名包括：“林賜”(卷三第7版)、“支”(卷三第21版)、“中”(卷五第2版)、“𠄎”(卷五第4版)、“才”(卷五第15版)（《五山版中國禪籍叢刊第三卷：燈史三他》，第718頁）。本文所錄刻工名，是筆者核對過原件的結果。

<sup>46</sup> 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“藏經書院文庫”，是指藏經書院的松村甚左衛門於大正三年(1914)捐贈的近五千冊藏書，包括：淨土真宗典籍721冊，中野達慧等編《大日本續藏經》(京都：藏經書院，1905-1910年)所據底本等4270多冊。關於該文庫，參照：[日]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編《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六十年史》(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，1961年)第3章第3節4a“特殊文庫”解說(第202頁)。

<sup>47</sup> 原址京都寺町通四條上大文字町的中野市右衛門，是京都書林的老字型大小書肆，由中野道伴(?-1639年)於江戶初期創辦。該書肆至寶永年間(1704-1711年)停業為止，刊發了很多佛教、儒教、醫藥、漢文古籍的古活字版。關於中野道伴生平，參見：[日]安藤武彥《出版書林中野道伴傳關係資料》(《日本古書通信》第376號，後收入《齋藤德元研究》，東京：和泉書院，2002年)、[日]森潤三郎《書肆の學者》(《考證學論考——江戸の古書と藏書家の調査》，東京：青裳堂書店，1979年，第一部第241-244頁)等。

行小字 20 字；版心注明“指要錄(卷次)(版次)”；3) 每卷增加卷首目錄，顯示該卷所收佛典簡目、便於讀者查閱；4) 將傳統版本中的避諱缺筆字改為正規繁體字；5) 添加了日式訓點，以輔助日本讀者理解漢文。

《中野版》在日本頗有影響，《昭和法寶總目錄》收錄的《指要錄》<sup>48</sup>、《國譯一切經》的日譯本<sup>49</sup>皆以其為底本。但需要注意，《昭和法寶總目錄》雖以萬治二年刊本為底本，但作了大幅度調整：1) 僅收錄了漢文部分，未採納底本中的日式訓點；2) 刪除了底本卷一卷首的官文書和惟白序<sup>50</sup>；3) 效仿《中野版》於各卷附卷首簡目，但刪除卷一前官文書和惟白序時，錯刪了卷首簡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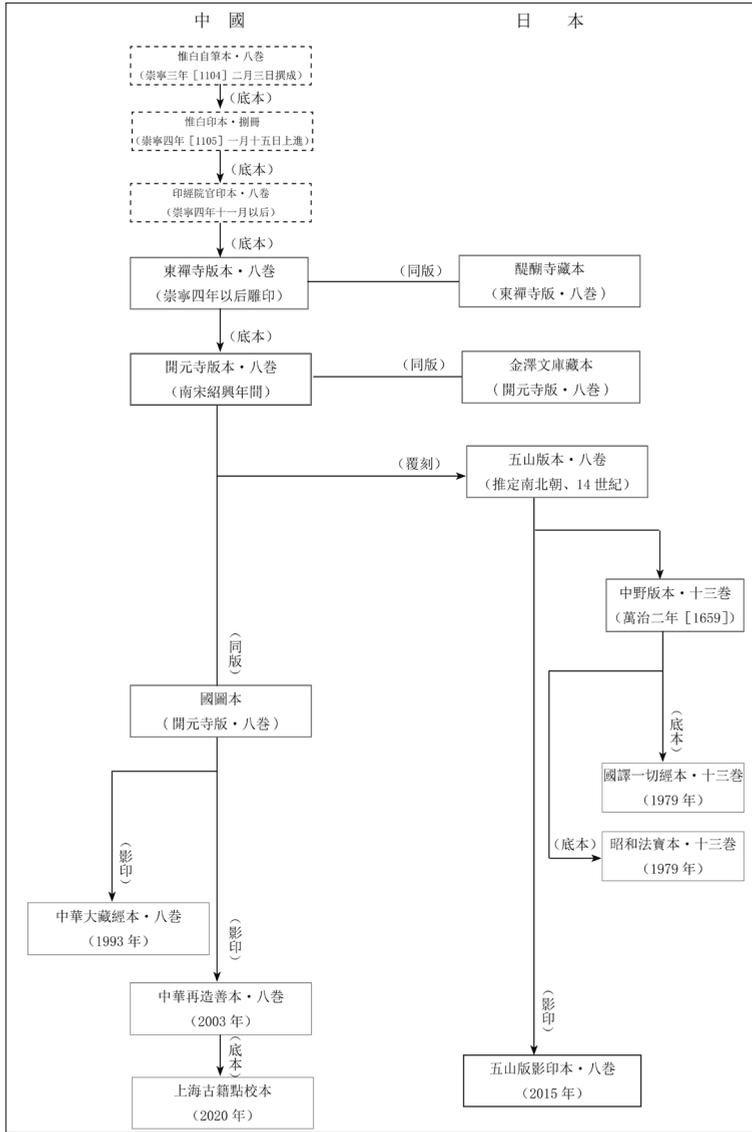
## 結語

本文勾勒了《指要錄》自十二世紀初成書、入藏以後直至 2020 年點校本問世為止的近千年間於中、日兩國的版本流變，著重討論了北宋東禪寺版、南宋開元寺版，日本十四世紀中後期的五山版以及萬治二年中野版等版本之來歷、特色及其影響。現將文中所涉《指要錄》各種版本的關係圖示如下：

<sup>48</sup> [日]高楠順次郎編《昭和法寶總目錄》第二卷(東京：大正一切經刊行會，1929年)所收《指要錄》之底本是“萬治二年刊宗教大學藏本”(第571頁注①)。“宗教大學”即今大正大學。

<sup>49</sup> [日]蓮澤成淳譯《大藏經綱目指要錄》，《國譯一切經》(和漢撰述部 29-30，目錄、事匯部 1-2)，東京：大東出版社，1940-1941年。

<sup>50</sup> 《昭和法寶總目錄》本《指要錄》刪除了卷一前的尚書省敕牒和惟白自序，成為該本最嚴重缺陷。



如圖所示,《指要錄》撰成於崇寧三年二月,翌年初惟白雕成經板後向朝廷進獻印本。同年十月二十八日徽宗降旨予准入藏,十一月初尚書省禮部下達敕牒,惟白隨即將其所備經板交付印經院用於印造流通。官印本《指要錄》(即開寶藏本)雖採用惟白所獻經板,但比單刻本多出了禮部敕牒。隨後,福州的東禪等覺禪院據官印本覆

刻了東禪寺版《指要錄》並編入大藏經；至南宋紹興年間，開元寺又以東禪寺版為底本雕成了開元寺版《指要錄》並編入大藏經。無論北宋印經院官印本、東禪寺版本或是開元寺版本，已知的宋版《指要錄》皆以惟白單刻本為源頭。《指要錄》在國內曾一度失傳，所幸清末楊守敬自日本傳回一套開元寺版本，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。國圖本先後被收入《中華大藏經》和中華再造善本系列，上海古籍出版的《指要錄》點校本即以後者為底本。此外，《指要錄》隨福州藏一同流傳到日本後，在當地衍生了新的版本：其一即南北朝時期以開元寺版為底本刊行的《五山版》；其一乃中野市右衛門萬治二年刊行的《中野版》。後者在日本影響較大，二十世紀初付梓的《昭和法寶總目錄》和《國譯一切經》皆以其為底本。

從版本文獻學的角度來看，開寶藏、金藏以及高麗藏等同屬中原系統大藏經，福州二藏則屬江南系統大藏經，兩種系統無論於其所據底本、編目和外形特徵，還是在雕版地點和流通範圍等諸多方面都有顯著差異。而關於《指要錄》版本源流的討論，則觸動我們思考單刻本和大藏經，以及不同系統的大藏經之間的內在關聯。雖然《指要錄》是大藏經研究中較為特殊的個案，但它仍然凸顯福州藏在中土著述方面對開寶藏的繼承與弘揚。福州藏收編的佛教中土著述雖不及金藏豐富，但它影響的時代和地理範圍相對較廣，尤其推動了中土著述向海外的傳播。因此，關於福州藏在中土著述的繼承與傳播方面的突出貢獻和廣泛意義，仍有待學者進一步深入討論和研究。